



沈从文
文学理想研究
康长福、著



康志远著

沈从文 文学理想研究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 / 康长福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ISBN 978-7-01-004865-9

I. 沈... II. 康... III. 沈从文(1902~1988) — 文学理论 — 思想评论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959 号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

SHENCONGWEN WENXUE LIXIANG YANJIU

作 者: 康长福

责任编辑: 关 宏

封面设计: 祁小嘉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出版日期: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8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04865-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重造的工具”与“工具的重造”: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2)
第二节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的历史回眸与现状扫描	(5)
第三节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的误区及价值预期	(8)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源性生态环境与沈从文“重造的工具”的文学理想确立	(15)
第一节 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沈从文以文学作为工具重造民族的理想孕育	(16)
第二节 现代中国的意义危机与沈从文以文学作为工具重构意义体系的目标确立	(23)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政治危机与沈从文以文学作为工具超越“现实”的梦想形成	(28)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源性生态环境与沈从文“工具的重造”文学理想的生成	(37)
第一节 文学的商品化促使沈从文举起“工具重造”的理想旗帜	(38)
第二节 文学论争的失范催生了沈从文“超越世俗爱憎”的文学追求	(44)
第三节 现代作家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复杂性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选择	(48)
第三章 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59)
第一节 直觉朦胧时期	(59)
第二节 感性认知和摸索实践阶段	(61)
第三节 理性自觉和逐步成型阶段	(62)
第四节 “孤帆独征”和寂寞坚守时期	(65)
第四章 人性神庙的构筑: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基点	(71)
第一节 沈从文的人性诗学	(72)
第二节 健康人性的礼赞	(79)
第三节 残缺人性的批判	(89)
第四节 向人性远景凝眸	(95)
第五章 探寻生命的庄严: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核心	(101)
第一节 在现实与历史、“边地”与都市的交汇点上谛视生命	(101)
第二节 沈从文的生命思考	(105)
第三节 退化生命形态的剖析和批判	(110)
第四节 理想生命形态的刻画和雄强生命力的张扬	

.....	(113)
第五节 生命探寻的困惑	(117)
第六节 “神在生命中”:超越困惑的生命意识升华	(121)
第六章 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归宿	(130)
第一节 民族品德堕落的现实原因与历史根源	(132)
第二节 挖掘重造民族品德的精神文化资源	(140)
第三节 重造民族品德的现实途径	(148)
第七章 重造文运:文学精神的堕落与拯救	(165)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文运的堕落	(166)
第二节 堕落的救赎:重造健康的文运	(180)
第三节 反对“差不多运动”:从根本上克服文运的内在 危机	(198)
第八章 重造经典:艺术审美的危机与突围	(209)
第一节 沈从文的经典追寻之旅	(210)
第二节 沈从文的经典观	(213)
第三节 重造经典:克服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危机	(220)
余论	(244)
后记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2)

绪 论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沈从文说：“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¹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自我为支点、以文学为杠杆来推动世界的求索者和实践者。他的求索和实践，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篇章，铸就了别样的辉煌。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存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学发展史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是一个寻求梦想、高扬理想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巨人而且也提供了产生巨人生态环境的时代。沈从文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文学巨人。作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迁和文学发展文字记录和艺术档案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我们解读中华民族寻梦历程的重要符码。因此，将其置放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几千年的纵向轴线和恢弘壮阔的 20 世纪世界文学横向轴线的交叉点上，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特定生态环境，仔细梳理它的发展流变轨迹，认真分析它的成败得失，科学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客观评价它的价值意义，准确把握它的地位影响，必将对民族的发展和文学的进

步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沈从文作为一个无法绕开的独特而巨大的历史存在,尤其需要强化对他的认识和研究。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如政治干预、时代制约、观念和方法的局限、眼界和视域的不够开阔、资料和史据的残缺不全等的影响,对沈从文的研究与对同时代文学成就相当的作家,如鲁迅等人的研究相比较而言,² 不仅显得过于单薄,而且长期在歧途和泥淖中徘徊。³ 直至 20 世纪新时期以来,封笔改行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已经 30 多年的沈从文,才随着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研究界的拨乱反正运动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对他的阅读与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但迄今为止,仍有一些课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深入探讨,譬如关于他的文学理想研究,即对孕育他文学理想的文学生态环境、形成过程,其文学理想的丰富内涵、精神资源、价值意义,以及他对文学追求的独特性、前瞻性、探索性等,尚缺乏深刻的解读与全面的梳理,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化阐释。

沈从文研究是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他自身命运沉浮的曲线而消长的,可以说,沈从文研究的波峰谷底的历史,折射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也勾描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曲折的“心电图谱”。从一个人的文学理想和艺术追求能够了解一个时代的变迁,能够解读在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发展轨迹,更主要的是,能够触摸和感受到记录这一时代变迁和民族脉搏的文学的历史本真存在,这样的研究应当不无价值。

第一节 “重造的工具”与“工具的重造”：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对一个文学家而言,审美价值预期与艺术目标定位的高低,往

往决定了他文学成就的大小。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坚守人格底线、抗争恶劣的文学生态环境、执著追求个体审美理想、生命理想和人类共同美好生活远景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文学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在于对理想图景的憧憬,更在于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中有所启发,引起感觉、想象,重新体验、思考、发现生活,达到“生命的明悟”而进入理想境界。他的“城、乡之间边缘人”的矛盾心态和尴尬角色,传统、现代之间的两难处境,地域的、民族的而非政治的文化选择,游离于党派、社团之外的独立姿态,使之拥有了当时少有人能企及的强烈的现代孤独感和悲剧意识——“我似乎正在同上帝争斗。我明白许多事不可为,努力终究等于白费,……”⁴但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⁵不能逃避孤独,屈服于命运。“为了否定它,也就把我永远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吉诃德’!”⁶支撑他承担孤独、抗争悲剧命运的勇气和在云诡波谲、险象环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暗夜独行”和“孤帆独征”的精神支柱,⁷是其一经确立就矢志不渝的文学理想,以及对文学宗教般的皈依和对理想教徒般的虔诚——“……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把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⁸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仅是文学实践的起点和归宿,而且是他的精神宗教和灵魂主宰,是他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全部。因而,研究沈从文,必须首先研究他的文学理想,并以此作为深化沈从文研究的原点。

沈从文简洁地把其文学理想概括为:“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⁹1946年底,重新回到自己文学起步地——北京——的沈从文,在认真审视和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学艺”生涯和人生历程后,仔细清理出驱使他从小偏远的湘西来到北京,并选择文学作为人生道路的缘故:

“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¹⁰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他的文学理想：一是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我们可称之为“重造的工具”；二是通过文学的重造来实现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抗争文学审美危机的艺术理想，即“工具的重造”。“重造的工具”和“工具的重造”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有机结合——人性、生命、民族品德和社会、国家、民族的重造，离不开文学的重造；而文学的重造，又能推动人性、生命、民族品德和社会、国家、民族的重造。因而，他的文学理想是“重造的工具”与“工具的重造”的合而为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是“功利追求”与“艺术创造”的高度和和谐，是文学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并重；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国家、民族的现实与人类远景的理性思考和自我设计，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大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审美创造意识、艺术探索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节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的历史回眸与现状扫描

如果以唯刚(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大学与学生》一文作为沈从文研究的起点,¹¹沈从文研究已走过了近80个春秋。纵观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的曲折起伏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毁誉不一时期,大体在1920年代中、后期至1940年代末;二是全盘否定时期,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三是拨乱反正时期,198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中期;四是全面深入时期,1980年代中期至今。¹²

最早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进行分析并较为准确定位的是苏雪林,她说:“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¹³另外,苏雪林还从叙事语言、文体特征、结构布局等方面指出了沈从文在“工具的重造”上的自觉追求。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是李健吾,他不仅肯定了沈从文在艺术审美上的独特追求,称其是一个“艺术家的小说家”,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而且还指出了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人性思想价值。¹⁴此外,其他研究者的一些零星片语也能触及到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重造的工具”的本质。¹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先生在《辰州途中》一文里,通过对沈从文单篇文章的具体个案分析,深入挖掘他的文体特征和写作特点,从而肯定其“却有文学的价值”。……与对沈从文的认真解读相比,是来自文坛左翼或右翼的简单误读和粗暴否定,认为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对于社会的进展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是毫无启示的;并且

就是从美的观点看,它们也不能发展出美的外形或给读者以美的感觉”¹⁶;“总之,沈从文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么,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家’的头衔吧”¹⁷。即便是伟大者如鲁迅先生,也在1930年代沈从文呼吁端正“文学者的态度”,“反对文学上的差不多运动”,高扬“工具的重造”理想主义旗帜时,讥刺他是自讨苦吃,坏了做奴才的规矩,“忠而获咎”。¹⁸抗战初始,沈从文因坚持“工具的重造”审美理想,反对创作上的“抗战八股”,而遭到巴人、孟超、罗荪等人的粗暴批判。¹⁹到1940年代后期,来自左翼的声音不仅彻底否定了沈从文文学理想的价值,而且在政治上把他打入“另册”——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²⁰分别给沈从文套上了“地主阶级的弄臣”、“当代文素臣”、“桃红色作家”等吓人的帽子。郭沫若甚至认为,“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基本上决定了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后期30年间沈从文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的终结,也定下了这长达30年的沈从文研究调子。

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判,无论是否定还是重新肯定,大都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而非文学、学术的层面进行,权力话语的强势侵略和时代氛围的刚性制约非常明显。进入新时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学者的良知和探索的勇气使少数人像凌宇、吴立昌、王继志等开始对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人性内涵及价值加以关注和研究。²¹然而,当时那场全国性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讨论和大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疑极大的影响了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尤其是“人性”内涵的挖掘和探讨。²²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真正迎来了沈从文研究的春天,真正开始了对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最显著的标志是多种研究专著问世,大量学术论文刊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自1990年代初至今10余年间,约有四十部专著和上千篇文章专门研究或涉及沈从文的文

学理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²³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在地方性与整体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的冲撞、整合、调适的宏阔视域中,把握沈从文文学理想的现代性品格,深入思考了其文学理想的核心内容——生命哲学及其人性观念,从而澄清了许多诸如“描绘湘西风情画的圣手”、“乡土抒情小说的代表作家”、“田园牧歌的弹奏者”、“都市文明的批判者”等对沈从文的片面理解或据其表象而得出的简单性判断。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²⁴偏重于从作家心理意识的理性结构角度,去把握沈从文的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文化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社会历史思考与审美追求之间的关系,从而探寻沈从文文学理想的“独特性”。王继志的《写我自己的心与梦的历史——评沈从文的文学观》,²⁵则是系统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和审美追求的重要文章,他随后出版的专著《沈从文论》,着重梳理了沈从文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分析了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内涵。杨洪承的《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是较早地明确将沈从文重造民族品德的社会理想和艺术探索的审美理想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性把握的论文。²⁶范培松的《描写“魔性”生命力的圣手——沈从文》是较早关注沈从文生命意识的论文,触及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核心——重造生命,对全面解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具有启迪价值。²⁷张清华的《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沈从文文化策略的一个回顾》,²⁸明确地在启蒙话语中把握沈从文的文学理想。1990年代前后,一批重要的沈从文研究专著纷纷出现:凌宇的《沈从文传》、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金介甫〔美〕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人性的救疗者”——沈从文传》、贺兴安的《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韩立群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王保生的《沈从文评传》等,²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等内涵,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度。

进入新世纪后,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中关于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等“重造的工具”内涵的探寻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质量较高的文章,系统挖掘沈从文的人性观、生命观和启蒙思想。如对沈从文生命观的研究,研究者分别从生命态度、生命美学、生命意义、生命意识、生命理想、生命追问、生命形式、生命原始精神、生命原始强力、灰色生命形式、死亡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细致的探讨。而最有分量的文章应是凌宇的《沈从文的生命观和西方现代心理学》³⁰、《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³¹和王继志的《论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³²。凌宇的前一篇文章,成功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沈从文的生命哲学内涵、价值与成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则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王继志发现了沈从文生命意识中内含的尼采“超人意识”、叔本华的“唯意志理念”等复杂成分,丰富了沈从文的人性观、生命哲学的内涵。此外,张光芒的《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初探》³³等文章,将沈从文“重造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与实践追求置放在现代理性意识的烛照下,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思潮背景,加以思考和定位。

第三节 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的 误区及价值预期

我们不能不承认,几乎所有的读者和研究者都被沈从文的“独特性”吸引,尤其被他的特殊的题材、异样的语言、多变的文体、别致的情调所吸引。即使在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的1950~1970年代,人们也承认“他有意借着湘西黔边一带等陌生地方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的力量,……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他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

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³⁴直至新时期以来,从语言、结构、文体、情调等方面对沈从文作品进行的纯形式批评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但这些解读总给人一种隔膜之感。正如沈从文本人在60多年前不无悲哀地说的那样,“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³⁵实际上,纯粹从思想内容、价值观念来研究沈从文或单纯从艺术技巧、创作方法、文体特征上来解读沈从文,都可能把他文学理想中有机相连的两部分内容割裂开来,都会无法走近一个完整统一的沈从文。这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陷阱,也是目前研究界的一个薄弱环节。³⁶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很少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生态环境,明确把沈从文的人性重造与抗争现代中国的政治危机、生命重造与抗争民族危机、民族品德重造与抗争意义危机结合起来,分析内在的逻辑关系,并挖掘其中的深层原因。人是历史的具体的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把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孕育和生成置放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中,结合他个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传统、人生体验、个性心理特征等因素,将他文学理想的两方面内容综合起来考察,都会对他的“独特”魅力究竟来自何处不可能有真正了解,不可能对沈从文进行全面、客观、准确地定位。因为当我们已认识到沈从文构筑的瑰丽而神秘的湘西世界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地域范畴,像鲁迅的“鲁镇”、废名的“竹林、桃园”、芦焚的“果园城”一样是创作主体的精神家园时;认识到他的“重造民族品德”的追求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一样属于“五四”文学的启蒙话语框架而非创见时,那么,无论从哪方面说,沈从文的“独特性”都不复存在,至少是不再那么明显。

怎样从文学理想与审美预期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沈从文的“独特性”?他的“独特性”是在怎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形成的?

与其自身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有哪些思想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他是如何超越少数民族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局限而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对人、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社会、国家、民族进行设计的?其具体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又是怎样坚守自己的理想并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付诸实践的?这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于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有哪些影响?特别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为什么在当时易遭误读而不容于时代?难道仅仅是因为它的前瞻性?其智性思考和诗性诉求的本身,或者说沈从文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和期许有没有不够准确或不够科学的地方……所有这些,既是本书写作的缘起,也是准备解决的问题。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在详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个性心理特征,分析其文学选择及其文学理想的必然性;在启蒙话语体系和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建设的进程中,充分挖掘沈从文文学理想的丰富内涵,把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自由主义立场与审美追求和艺术探索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彰显其文学理想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

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坚持穿透遮蔽、回到历史现场的立场,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哲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的一些观念与方法,尽量走近沈从文,体验沈从文,剖析沈从文,在解构沈从文的同时重铸沈从文。同时,坚持历史的与美学的相一致的原则,思想分析和艺术批评相结合的立场,力图全面、客观、科学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及其价值,力求达到从沈从文出发又能回到沈从文的逻辑统一。具体做法是,紧紧抓住沈从文“自己惯有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意象”³⁷,如“人性”、“生命”、“民族品德”、“文运”、“经典”、“重造”、“试验”等,体验他对社会人生的独

特观察、感受与认识,切入其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勾勒出他的社会理想与艺术追求的基本轮廓,将其文学理想的丰富内容系统化、条理化,以期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思想价值与文学成就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

本书拟定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生态环境与沈从文文学理想确立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学的审美创造与功利追求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即“重造”与“工具”之间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探究其文学理想中两个构成板块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张力,从而凸显沈从文将“重造的工具”与“工具的重造”紧密结合、有机统一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凸显他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对当时文学生态环境的超越性,以及在当今社会转型中如何进行审美创造和构筑人文精神大厦的警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注】:

1 沈从文:《谈进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2 沈从文的文学大家地位已得到国际普遍认可,1980年代曾两次被提名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在西方,沈从文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被认为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现代伟大作家。学者们往往把沈从文同鲁迅相提并论。一般认为,在那个历史时期,不管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参见《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存在于教育教学、社科研究单位;而沈从文研究却留下了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近30年的空白。(参见凌宇:《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4 《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1页。沈从文的孤独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认为“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折的一种反应现象”(参见《湘行散记·序》,全集第16卷第394页)。凌